

在五四的延長線上

——評歐陽哲生《政治與文化的雙重變奏——五四運動的本事、紀念與詮釋》

● 陳學然

本書有一半的篇幅是對五四自發生以來的百年研究史的深刻檢討，另外一半篇幅是對五四及相關人事物的深層闡釋，有助於重構五四歷史現場、溯源窮流、探析人事以及思想新詮。



歐陽哲生：《政治與文化的雙重變奏——五四運動的本事、紀念與詮釋》（香港：中華書局，2023）。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歐陽哲生是研究五四運動的代表學者之一，其新著《政治與文化的雙重變

奏——五四運動的本事、紀念與詮釋》（引用只註頁碼）於2023年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該書一共分為上、中、下三篇。上篇名為「本事篇」，由四篇文章組成；中篇是「紀念篇」，由兩篇文章組成；下篇是「詮釋篇」，由三篇文章組成。全書共有九篇論文，是他近十年來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研究心得，經過重新訂正後彙編而成。

筆者認為本書對於檢討過去以及展開未來的五四研究，有很大的參考價值。正如作者在〈自序〉裏所說，他於1980年代中期便進入這一領域，是四十多年來海內外五四研討會的常客，並且在五四的策源地與搖籃——北京大學，先後籌辦了五四八十周年、九十周年、一百周年的大型國際研討會（〈自序〉，頁ii-iii）。作者對於五四運動的學界研究潮流、五四研究史瞭如指掌。本書有一半的篇幅是對五四自發生以來的百年研究史的深刻檢討，另外一半篇幅是對五四及

相關人事物的深層闡釋，對重構五四歷史現場、溯源窮流、探析人事以及思想新詮等，都作了重要的研究貢獻。本文以該書部分篇章為重點，對其思想內容作簡要的討論與評價。

一 五四運動：「事件」與「主義」

作者以〈作為「事件」的五四運動——從檔案文獻看北洋政府對五四運動的處置〉作為全書首篇文章，無疑是別出心裁的安排。文章所運用的檔案文獻選自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史料、當時的北京流行報刊、涉事者的日記與回憶錄等，在質與量方面均讓人歎為觀止，仿如回到了歷史現場，觀察北洋政府如何處置五四運動。具體來說，就好像讓讀者直接化身為法庭裏的陪審員，正襟危坐於法官側面的高座，靜觀法官對五四這宗歷史大案涉事者的審查、盤問，然後在聆聽結案陳辭後，作出各種判斷。要是作者沒有三四十年累積的研究功力，很難調動如此豐富的檔案文獻來重組案發經過。作者順着時態發展的推理，把1919年5月4日三十二名學生被捕的歷史場景鋪陳在讀者眼前，頗有偵探的味道，抽絲剝繭，讓我們從曹汝霖家的傭人、曹宅外雜貨鋪掌櫃父子、警察、示威學生等的訪談與記錄裏看見「火燒趙家樓」的第一把火是如何被點燃的，而章宗祥被毆打的過程又是如何發生的。這些敘述都讓讀者猶如穿越時空，親臨其境。

對於學生被捕後關押到衛生條件十分惡劣的監獄的情景，作者也用了不少筆墨勾勒。他們的大小二便只能在狹小空間裏解決，惡臭薰天；一大群人共喝一盆水解渴、共用一盆水洗臉。此情此景，百多年後仍讓人想像到北洋政府時期監獄慘無人道的一幕。然後，書中展示了審訊的過程以及社會各界對學生的聲援等，闡釋十分詳細。作者指出，愈是隨着時間推移，回憶者的記憶內容就愈為豐富、詳細。借用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說，可以發現五四領域同樣也有不少回憶者「層累增加」式地敘述自身經歷，讓一些歷史回憶變得不穩定、不真實。作者之見確實切中肯綮。當然，這一切也是構成五四研究複雜性的因素。

反過來說，不準確的回憶也構成了五四研究史的一環。不同的敘述為我們打開了不同的五四研究空間，甚至在微觀的研究裏揭露了一場歷史運動中不為人知的幽暗面。譬如，放火焚燒趙家樓的可能是曹汝霖本人，目的是燒死學生以洩怨。在時人的陰謀論下，火燒趙家樓被認為是北洋政府嫁禍於學生、從而加重學生罪名的舉措——罪有多重，懲罰便有多重，這樣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打壓學生；甚至坊間流傳五四事件是徐世昌與在野的研究系合謀，意在打擊握有實權的親日派段祺瑞（頁53）。

歷史的真偽不易辨明，但廣泛運用檔案文獻與各種當時流行的報刊雜誌資料，為五四運動發生背景的複雜性提供了一個新的觀察視角。當不同的史料紛呈時，五四便

在五四領域中，不少回憶者「層累增加」式地敘述自身經歷，讓一些歷史回憶變得不穩定、不真實。反過來說，不準確的回憶也構成了五四研究史的一環。

五四作為一個歷史時期、一個時代的轉折點，反映了「主義」如何進入現代中國的歷史長河，並且推陳出新地引領時代的潮流。「主義」被時人看作思想武器及精神利器，進而武裝他們的行動。

如同萬花筒一樣，讓我們看見不同的圖景。從學生被捕後的各種言論、反應以及政府對策，可以看見運動得以擴散的背後原因，了解到當時北洋軍閥政府內部、社會輿論對於學生事件的不同反應，從而理解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絕簽訂對德和約的真正原因。

第二篇文章〈從五四時期的「主義」建構到中共初創的行動綱領——五四思想的動態考察〉講述五四時期的「主義」，然後展現「主義」如何影響中共建黨初期的行動綱領。五四作為一個歷史時期、一個時代的轉折點，反映了「主義」如何進入現代中國的歷史長河，並且推陳出新地引領時代的潮流。新時代的弄潮兒為中國迎來了各式各樣的「主義」——先後有無政府主義、易卜生主義、實驗主義、馬克思主義、新村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平民主義等。這些「主義」的輸入，成為了傳統儒學的替代品。在經過一番爭鳴、淘汰後，社會主義思潮中的蘇俄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脫穎而出，作為一批有志於改造社會的知識精英的行動綱領。「主義」被時人看作思想武器及精神利器，進而武裝他們的行動。五四一代社會動員方式的組織化、政黨化，便是始於對「主義」的實踐，而實踐主義也催生出革命的訴求與行動方案。當然，各種各樣的「主義」，都有可能演變為一種激進的思潮，但過於興盛龐雜的主義，正如作者所說，會讓人們對烏托邦的理想幻滅，反而對理論產生質疑（頁80）。五四時期「主義」興盛，當中的缺點也讓我們有更多的方向去反思

五四。從五四一路走過來的中國，讓我們更加重視實事求是、腳踏實地的社會改革方案。正如「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比空談主義往往顯得更有價值（頁80）。

二 蔡元培的新文化理想與困境

接着是「本事篇」的第三篇文章〈蔡元培的新文化構想及其現代意義——《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蔡元培卷》導言〉，需要與「紀念篇」的第二篇文章〈新文化的理想與困境——蔡元培看五四運動〉結合起來閱讀。後者雖是全書中篇幅最短的，但很能引發讀者內心的感受與共鳴。作者刻畫了一位富有情感及有血有肉的教育家形象，他品德高尚，富有人格魅力，具有穿越時空的精神力量（頁81）。儘管如此，作者對蔡元培的一些看法或許值得在此再作一些引伸及闡發。

眾所周知，蔡元培參與了五四運動的學生救援工作，更是新文化運動的「守護神」。不過，作者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蔡元培對於學生愛國運動所表現出的「矛盾」態度。蔡元培固然十分重視及肯定五四運動愛國救國的意義，但同時也十分擔心罷課風潮鬧大後，學生不懂節制、不斷地參與社會運動，從而被政治利用甚或被政客動員去參與其他不是學生應該做的事情。這樣不只對學生本人，而且對國家的前途而言，都會帶來禍害。

該文引述了大量蔡元培的言論來說明學生應該專心研究學問，對

於社會政治問題，學生不必獨力承擔改革的責任，而應該增進學養知識，鍛煉身體，裝備好自己以成就更偉大的事業。但作者認為，既要學生愛國，又不想他們太過投入愛國運動，反映蔡元培自身的思想出現了矛盾（頁229）。不過，這一論述還是值得進行深入探討的，否則我們對蔡元培如何看待學生運動的問題便會流於表面和簡單化。

事實上，在列強進逼下國家尊嚴受挫、國之將亡的時刻，學生表現出愛國主義精神，並付諸行動的愛國義舉是應該被肯定的，這也是蔡元培的本意，即他強調的「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愛國」（頁221），他更因而敢於去保釋學生，用實際行動支持學生。但是，當五四運動已經成為各國關注的事件，更迫使中方代表拒簽巴黎和約，曹汝霖等「賣國賊」也遭到罷免而社會已高度關注事件的時候，在蔡元培看來，學生便應該適可而止，停止參與街頭運動，回到教室繼續學習。

無疑，學生有理想、有血性是值得讚揚的，但是他們也有本身的視野限制、思想盲點，以及身份上的局限。五四運動發生時，學生雖是重要的發起人及參與者，但一旦嚐到了成功的滋味，便出現五四學生領袖羅家倫所批評的「學生萬能」的心態^①。他們的雄心壯志便變成了一種政治熱情，甚至直接視干涉政治以至救國為義所當為的事，伴隨而來的不只是對權力的挑戰，也在爭取話語權的過程中生出對權力控制的欲望。當學生自以為「萬能」的時候，便變得「趾高氣揚」，做事易於浮躁輕率，養成驕惰氣習^②；

而過於介入政治、過於沉迷社會運動，便有可能迷失方向，特別是受到不同背景的政客操縱、利用、動員，使他們錯過了學習的黃金時期與機會，淹沒於政治洪流當中。最後，學生運動便出現了羅家倫在五三一周年所觀察到的現象：「不但人材破產，而且大家思想一齊破產。」^③然而，在羅家倫乃至蔣夢麟、蔡元培眼中，不少學生在參與群眾集體運動後，所做的事其實已與五四運動的精神相違背，當他們手上擁有了一些權力，就容易變得自大到極點、囂張跋扈^④。蔡元培便把運動裏的一些學生的行為直斥為「暴動」、「懦夫」^⑤。慢慢地，學生失落於運動中，也成為了被犧牲的一代人。

舉凡政治運動，犧牲最大的往往是學生群體。1920年代爆發的連串「學商衝突」、「工學衝突」、「師生衝突」，便是學生在嚐到了勝利滋味後不斷擴大運動的結果。他們以愛國之名，要求各階層繼續支持他們曠日持久的罷買、罷賣、罷工行動，強制商人不准買賣日貨，甚至搶奪店內日貨公開焚燒示眾，在碼頭或工廠與工人展開檢查「仇貨」的紛爭。學生運動變成了干涉社會群眾日常生活的行動，擾亂了社會經濟運作，與民眾脫節，進一步激進化、孤立化。

正如呂芳上、李達嘉等學者所說，「學生」本來只是一個身份，他們在運動初興時，愛國救國的赤子之心有助於感染國人響應他們的行動、同情他們被拘控的遭遇。一旦得不到商人、工人乃至更多專業階層的支持，他們便會在經濟、物資

作者認為，既要學生愛國，又不想他們太過投入愛國運動，反映蔡元培自身的思想出現了矛盾。不過，這一論述還是值得進行深入探討的，否則我們對蔡元培如何看待學生運動的問題便會流於表面和簡單化。

蔡元培在學生運動的不同發展階段中表現出的不同期待，以及實事求是的身為人師的要求，相互間並沒有矛盾，而且應當予以肯定。

援助等各方面失去保障，同時也會在得不到家人的認同下變得孤立無援、彷徨失據，進而導致精神煩悶、困頓。他們往往只能依賴政客的接濟與收編，甚至淪為政治的工具。這是十分值得我們注意及反思的問題；同時，筆者認為呂芳上與李達嘉的相關研究很適合與本書對讀^⑥。

因此，在本書核心的關鍵詞或主線——「主義」如何產生與引領時代新潮流的問題上，我們首先要了解的是五四後中國學生界與知識界一度出現煩悶空氣的社會底蘊。「主義」的出現及興盛，本身就是五四以來青年的精神苦悶所致。關於這點，王汎森多年前關於「主義」的研究已有十分深刻和詳細的探討^⑦。不難看到，學生的精神苦悶與他們在運動中喪失了方向有很大的關係。五四運動本身是自立、自主及自發的，但被政治收編的五四讓學生的位置由中心變成了邊緣；從運動初期作為國家、民族的英雄，到1920年代變成了學者與商人均不待見的鬧事者；再加上運動以來學術的荒廢，愛國救國無門，以至於精神困頓。

上述兩篇專門討論蔡元培的文章值得關注，特別是〈新文化的理想與困窘〉談及蔡元培對學生運動的支持與批評這兩種不同價值取態問題。五四運動本由學生發起，但社會不能過於倚賴學生，學生也不能過於自我中心，應該適時抽身而去，不能忘卻自己的身份而無節制地投身運動。

進一步說，五四時期還有很多重大議題的提出，就如本書作者所說，在當時都沒有受到學生乃至知

識群體嚴肅看待。對民主、科學的學理探研（如陳獨秀揭櫫的兩面現代文明進步大旗）；如何正確地重估中國學術及文化傳統的一切價值（如胡適倡導的具批判精神的文化繼承）；在面對強勢的西方先進文明時應怎樣正確地學習對方的長處（如對魯迅「拿來主義」的實踐與反思），這些都是學生群體應該好好研讀及學習的知識範疇，而這也正是蔡元培所說的「愛國不忘讀書」的真意所在。

然而，時代畢竟未有向蔡元培期盼的方向邁進，因而讓五四運動留下了遺憾，而運動的目標至今未達，實是其來有自。這些仍未實現的目標也成為了我們今天討論五四時所不能忽略、甚至在未來仍要繼續追求及實現的。在這個認識的前提下，如果說蔡元培在面對五四運動時存在精神上或思想上的矛盾，這便值得商榷了。事實上，蔡元培在學生運動的不同發展階段中表現出的不同期待，以及實事求是的身為人師的要求，相互間並沒有矛盾，而且應當予以肯定。當然，作者對於蔡元培理性而充滿溫情的教育家形象的刻畫，是很正確和深刻的，表現出蔡元培可貴而偉大的人格——「一個單純教育家的品性和良知」（頁23），值得細細品味。

蔡元培十分強調教育的神聖性與獨立性，學生身份也同樣有其神聖性與獨立性的一面。不只是學生的身份不應被政治滲入，教育本身也不應給世俗政治乃至非世俗的宗教所介入。1920年代，蔡元培強調「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與非基督教行動，都是我們在重新認識五四內

涵時不可以忽略的。有趣的是，當反抗基督教辦學不遺餘力的蔡元培在宣揚「以美育代宗教」的時候，1930年代他流落香港時公開演講其美學思想的場所，正好就是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主教座堂的聖約翰大教堂。

三 梁啟超與五四運動

作者在「詮釋篇」中細緻釐清「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些名詞的源起與流變，乃至近數十年來的研究成果，一方面總結了百年五四研究的思想脈絡，另一方面也為我們在未來的五四研究指明方向。本書以長時段的視域鳥瞰百年五四發展史，詳盡鋪陳了五四反對孔教、迎進「主義」、宣揚國族思想啟蒙乃至於個體思想啟蒙，並由此肯定思想自由、個性解放、民主政治的價值與意義。研究這些思想脈絡的演進，對於進一步拓展五四論域與詮釋話語也有重要的貢獻。

不過，作為五四研究的同行，筆者對於浸淫五四領域逾四十年的作者還是抱有更高的期待。不論是緊繞五四運動展開的「本事」研究——回到五四歷史現場，還是針對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詮釋」——開拓五四話語論域，本書還可以在深度與廣度上作進一步的擴展。譬如作者在「本事篇」最後一篇文章〈梁啟超的國際觀與晚年思想轉向——梁啟超著《歐遊心影錄》的思想新解〉中以近三十頁篇幅詳細論述梁啟超，透過他的《歐遊心影錄》來審視

其國際觀以至晚年思想轉向問題，說明梁啟超對歐洲的觀感，最後得出了梁啟超如何自我定位的結論。

作者關注梁啟超如何爭奪新文化運動的話語權，不願在新文化運動狂飆突進、凱歌行進之時失去新文化的旗幟而被視為過時的保守者，因此對歐戰後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弊病與思想混亂局面多有批評，此見對於拓展梁啟超思想世界的研究，無疑有很重要的意義。然而，上述諸論對於梁啟超與五四的「本事」——不論是政治或外交層面的五四運動/五四事件，還是文化層面的五四運動/廣義的「五四」，作者於本書裏還可以再多作闡述。

這篇文章的重點雖然在於着力撰述梁啟超遊歐見聞與思想轉向，但對鍾情於五四研究的讀者而言，也許會更希望作者深入扣緊「五四」話語或五四「本事」來闡述梁啟超遊歐與五四運動爆發的關係。梁啟超於1918年底至1920年間遊歐，自1919年2月中旬起更身處巴黎，期間還與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等一大批各國政要會面，爭取他們對中國的外交支持，同時又積極向巴黎和會傳達中國人的意願。值得關注的是，梁啟超在巴黎和會召開期間，頻繁致電國內名流與政要，傳送和會的最新消息。他先後揭發段祺瑞與日本私定密約，並將山東交涉失敗的消息報告國內，急電汪大燮、林長民呼籲國人，齊向政府及全權代表施壓以拒簽和約^⑥。梁啟超身在巴黎而鼓動國內民眾，力圖挽救國權的舉動，無疑是直接掀起浩浩蕩蕩的五四風潮的關鍵一步。

梁啟超身在巴黎而鼓動國內民眾，力圖挽救國權的舉動，是直接掀起五四風潮的關鍵一步。毋庸置疑的是，對於五四運動的爆發，梁啟超扮演了不可忽略的角色。

不論是繼承五四，還是反思五四、超越五四，這場運動的思想領袖如陳獨秀、胡適及魯迅等人提倡的思想觀點，諸如迎進「德先生」與「賽先生」、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等，到今天仍是我們在反思過去以至展望未來時的起點。

毋庸置疑的是，對於五四運動的爆發，梁啟超扮演了不可忽略的角色，而論者也視他「與五四運動有重大的關係」^⑨。如作者能夠在書中具體針對梁啟超遊歐與五四的關係作出論述，會讓本篇更加完整及深入。此外，在作者探討五四「本事」——尤其是論及身在巴黎的梁啟超的相關內容時，關於曾經給予中國人無限想像及仰賴的威爾遜，如何在五四期間引起國人對他本人及美國的極端失望，梁啟超如何看待威爾遜向日本或列強妥協、讓步並犧牲中國利權的問題，以及他對於威爾遜的態度有何轉變等，都值得作者深入探究。這樣，不但可以對早於1913年便對威爾遜深抱好感的梁啟超的思想研究有更多的闡發，也可以讓梁啟超在五四運動中有更為清晰的定位。當然，這本身也是作者開宗明義要探究梁啟超晚年思想轉向時不可忽略的內容。

四 小結

本書還有很多重要的歷史研究文獻整理與深入論述，譬如「紀念篇」有關1949年以前各大黨派的文宣、不同陣營的報刊與學者或政要對五四的記憶與思想闡釋等，都有助於我們認識面相紛紜的五四精神圖像。同樣，1949年以後直至今天的五四紀念與研究，尤其是對於各種文獻材料的解讀、對五四歷史意義的省思，以及釐清各種「主義」與五四詮釋的交織糾纏，都有待繼續深挖細探。

當然，不論是繼承五四，還是反思五四、超越五四，這場運動的思想領袖如陳獨秀、胡適及魯迅等人提倡的思想觀點，諸如迎進「德先生」與「賽先生」、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等，到今天仍是我們在反思過去以至展望未來時的起點。就此，本書作者多年來堅持的觀點仍遠未過時——「我們仍處在五四的延長線上。」（〈自序〉，頁v）

註釋

①③ 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 窮則變一變則通一通則久〉，《晨報·五四紀念增刊》，1920年5月4日，第3版。

② 瞿世英：〈五四與學生〉，《晨報》，1921年5月4日，第2版。

④ 蔣夢麟：《西潮》（台北：世界書局，1971），頁141。

⑤ 有關論述可參見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2014），頁64-68。

⑥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到十八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424-25；李達嘉：〈罪與罰——五四抵制日貨運動中學生對商人的強制行為〉，《新史學》，第14卷第2期（2003年6月），頁66-81。

⑦ 王汎森：〈「煩悶」的本質是甚麼——「主義」與中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思想史》，第1期（2013年9月），頁85-137；〈「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頁3-88。

⑧⑨ 耿雲志、崔志海：《梁啟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頁286-89；289。

陳學然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